

GUOJIA MINZU YU YUYAN

国家、民族与语言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课题组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

编



语文出版社
YUWEN CHUBANSHE

责任编辑 王宏硕
封面设计 赖积华

ISBN 7-80126-910-1



9 787801 269102 >

ISBN 7-80126-910-1/H · 214

定价：58.00元

GUOJIA MINZU YU YUYAN
国家、民族与语言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
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课题组 编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课题组等编. -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4

ISBN 7-80126-910-1 / H·214

I. 国… II. 中… III. 语言政策-研究 IV. 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9769 号

国家、民族与语言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8.75 印张 48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顾 问 许嘉璐 孟吉平 傅永和 王 均
郝时远 道 布 孙宏开

主 编 周庆生

副主编 魏 丹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课题组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 枫 常全生 朝 克 陈振尧
丛铁华 葛公尚 姜淑琴 李桂南
李 崑 李兴仁 普忠良 阮文康
阮西湖 斯钦朝克图 唐裕生
王远新 吴宏伟 徐大明 杨寿勋
杨艳丽 於 斌 虞卫东 张宝增
张建萍 赵 杨 周庆生

国家语委政策法规室成员

魏 丹 郝阿庆 安均富 黄志敏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国家民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室

资助本书出版

Nation, Ethnicity and Language

Language Policy Studies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Edited by

*Anthology Editorial Staff,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The Division of Policy and Legislation,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Yuwen Press

序

许嘉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中有一个课题是“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当时我曾担任这个基金委员会语言学组组长。评审时绝大多数委员认为这个课题很有意义，经协商，一致同意了。当时我的想法是：我国的语言规划工作，从1950年正式开始，迄今已近50年。致力于文字改革的前辈们从30年代起即为之奋斗，支撑他们的，除了发展文化、强国教民的理想，还有从对国外经验的了解中得到的理念。而在这50年里，世界发生了极大变化，许多国家的语言文字及其规划工作跟半个世纪前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但是，我们的语言文字规划工作，却因为国家的封闭而一直是在一个“自足体系”里运行。现在，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要依照依法治国的方略应对全球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要满足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急迫需求。在这种形势下，“自足体系”已经远远不够，这样，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情况就是刻不容缓的了。我在国家语委工作了四年，对此尤有深切的体会。因此，在配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作语言文字立法前期调研时，国家语委就派人出国考察访问，收获果然不小。

课题的名称虽然冠以“少数民族语言”，但是任何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从来是与其主体语言（有的叫国语，有的叫官方语言，也有的和我们一样叫普通话）状况和政策密不可分的。事实上，该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也的确是着眼于世界各国语言政策的全面情况的。因此，这个课题的意义绝不只限于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提供他山之石。前年这个课题的第一个子课题《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译文集完成，我看了全部译稿，果然，就连我这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门外汉也收获很大。因此当课题组组长周庆生先生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时，我便高兴地应命了，而且后来还把那篇小文收进了我的《未成集》里。附带说一句，不无遗憾的是：直到《未成集》出版，《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尚未问世。而这两年，我国的语言学界和立法工作正急需这方面的资料。

今年2月，该课题的第二个子课题《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一书的清稿又放到我的面前。我既有先睹之幸，获益匪浅，所以当周庆生先生再次要我在书前写点意见的时候，我又高兴地答应了。

这部书选择了22个国家的语言文字规划情况进行研究。虽然全世界值得研究借鉴的国家不会只是这22国，作者们也只能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国别加以介绍和研究，但是，我觉得他们所选择的这22国既覆盖了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特别是英、美、德、加、坦、秘、哈、土、越、南非和前苏联等国，可供我们吸取的东西更多。因此可以说，这部著作已经做到了“以偏概全”。书中每一节（实际也就是每一篇），并不是纯客观地介绍有关国家语言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国家语言规划情形，而是在其中贯穿着作者的评价和议论，有些在文末还单列了小结、余论、思考与展望，这些对读者都很有启发作用。

我从这部书稿和作者们的议论分析中，就得到了很多启发。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自古以来，语言文字问题始终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关系到公民的人权。政府所制

定的语言文字政策是对民族，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态度的具体化。在现代，几乎所有国家都要解决国家或民族通用语（官方语言、标准语、国语等等）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不适当地强调通用语“惟我独尊”的地位，不尊重乃至剥夺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就像前苏联和 19 世纪时的美国那样，必然造成民族间的不和，即便使用强权压制，近期不会出现国家动荡或民族的分裂，但是由此而造成隐性矛盾、削弱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以致抵消社会前进的动力，则是避免不了的。反之，如果保证不了国家或民族通用语在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权威地位，不适当地强调少数民族语言在一个地区的惟一性，不但会破坏国家的统一，阻碍经济、文化、科学的进步，而且将直接限制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另外，对于多民族国家，不管少数民族是以聚居为主还是以散居为主，在一些地区内也还都有一个该地区各个民族间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的关系问题。世界上常有这种情形：一个地区内居于多数的少数民族只强调自己的语言在该地区的通用性，甚至产生一些奢望，与此同时却忽略或抑制该地区内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的语言的作用和地位，换言之，对“上”与对“下”，对“外”与对“内”，标准不同。其结果将同样是民族间的不和、进步的停滞，甚至酿成社会的动乱。世界上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实在太多了。究其原因，是人们狭隘的民族情结、关于语言文字规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于民族权利平等的曲解使然，说到底，是因为缺乏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和眼光。因此，语言政策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家和民族领导阶层的价值取向和整体素质。

在各国的语言政策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所制定的法律或实际所执行的政策，如果符合语言的和民族的发展规律，这个法律或政策就会见效，例如坦桑尼亚。相反的教训也是有的，例如秘鲁。这就告诉我们，语言法律和政策的制定，绝不仅仅是法律或政治领域的问题，它首先是学术问题；法律与政策，只能建立在牢固的科学的科研成果基础上，根据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情况，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来制定。在这里，仅仅从学术角度考虑固然是不够的，而局部地区或某些群体的狭隘视角同样是制定正确的语言政策的障碍。一种语言文字的地位，归根结底并不取决于法律政策所体现的决策者、当政者的态度和感情，决定性的因素只能是该种语言文字能否承担起法律与政策所赋予它的人际交流、信息承载、文化传承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有的发达国家，至今并没有在语言文字方面立法，但是并不妨碍在实践中形成强有力的语言政策。例如美国，它就用不立法的办法确立了语言的惟美政策，这一政策具有极大的排他性：教育、就业、选举、诉讼、公务等等最能体现语言地位的领域，一切少数民族语言都没有丝毫地位。有 23 个州甚至限制或拒绝提供非英语的教育等服务。这实际上和它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帮助是矛盾的，而与当年对印地安人所实行的种族灭绝（包括语言灭绝）政策倒是十分一致的。这一问题之所以没有引起本国人民包括少数民族人民的普遍反对，只是由于美国经济科技实力强大，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占据了惟一的地位，同时其就业机会多，少数民族居住和就业基本上是分散的，因而形不成集中的巨大的语言推动力。但是一统而繁荣现象的背后矛盾在潜伏着，今后美国如何处理国内的民族语言问题，值得注意。

我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语言文字问题，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但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却对语言文字的改革和规范给予了极大关注。从 1954 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开始，有关的法令法规陆续颁布。到现在，已经有十几部法律对语言文字的制订、使用、规范、保护有所规定。这些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尽快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50 年前设想汉字的前景

是实现汉字的拼音化。50 年来的实践，特别是计算机普及、信息化日新月异的事实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入研究证明，汉语用拼音符号书写至少是极其遥远的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调整了语言文字政策，突出了社会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同时扩大了语言文字工作的范围，开始了信息处理中的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但是，当年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订汉语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等工作，40 多年来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国家通用语的推广和文化的普及，而且在实现计算机处理汉字、键盘输入等技术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只要指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50 年代所制定的语言规划所产生的效益了；我国 50 岁以下的公民，几乎都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工具，通过规范的汉字学得文化科学知识的；而在信息处理技术发展过程中，拼音输入法鳌头独占，使用率一直不断上升。在汉语自动化处理实现之前，很有可能汉语拼音方案会成为中国人在网络上使用的第二“文字”。2000 年制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全国的通用地位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通用地位，并对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在不同领域的规范做出明确规定。这部法律是我国几十年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经验的部分总结，反映了当前我国文明建设对语言文字的要求。

我国也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汉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应该承认，我国政府从一开始所面临的民族语言问题和世界上所有国家是一样的。多少世纪以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主义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妨碍民族团结、国家兴旺的不利因素。但是，我们成功地消除了历史留下来的这一难题，在全世界显示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成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的几十年里，一直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妥善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在语言文字领域，既大力推广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又充分尊重和保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其各自区域内的通用地位和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50 年来，我国从没有因语言文字问题而出现民族纠纷，关键在于我国在这一领域里的“度”把握得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的原因是我国政府是为全国各民族人民谋利益的政权，制定语言文字政策所遵循的原则，是坚定地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各个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充分保证少数民族的地位和权利。在即将修订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法》里还要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地位和使用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与《通用语言文字法》相衔接。在这些法律的调整下，可以预见，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将会更好地承担起信息时代的任务，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无疑将是一个有力的保障因素。

本书中专有一节概述了我国语言文字规划的过程和现状，虽然比较简略，但是还是可以供读者用来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

2001 - 07 - 31

于日读一卷书屋

序

郝时远

周庆生同志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期间,因涉及到本所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合作关系,我曾勉为其难地参加过一次课题组会议并讲了一番话。但是,当这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摆在我面前并邀我作序时,那种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已经不是可以用勉为其难能够形容的了,语言学对我的确太陌生了,以致虽然没有推却但一直在拖拉。现在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了,好在这部著述是关于语言政策的,我就抱着学习的态度写一些个人的浅见。

人类源于共同的祖先已经是不容质疑的科学论断。人类虽然有种族之分、民族之别和语言文化相异的多样性,但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统一性是人类多样性的基础。在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表现中,语言的多样性最为普遍也最为突出,因为语言既是区别人与动物生理机能的产物又是创造文化的基础。当然,“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J.G. 赫尔德)是针对“语言神授”而言的,而人类口语脱离其他动物的进化则为人类在自然界中创造一个人的社会环境奠定了基础。

人类史前的初民时代,随着人类群体向各大陆迁徙流散,各个群体的语言也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道路。语言随着人类群体的分化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而形成不同的发声特点、表达方式和词汇,语言随着人类群体之间的交流、融合而发生着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和融为一体。语言如同人类群体形式的变迁一样,从同源到分流,从分流到整合,直到进入民族大千世界的门槛而随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趋于稳定。

国家的出现、民族的形成使语言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单一民族的国家,语言在国家特征的统一性和民族特点的统一性方面是同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语言在国家特征的统一性和民族特点的统一性这两个层面上则需要求同存异。但是,古往今来,在国际关系和族际关系方面实现求同存异的理念一直是艰难的。国家兼并、领土扩张、民族征服、殖民侵略都促使统治者、占领者、征服者为消除社会的异质性而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实行同化,其中语言同化是首当其冲的。久远的历史且不论,晚近的西方世界对全球的殖民主义扩张即可为此提供例证。

从15世纪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引发的西方国家殖民主义扩张,到19世纪达到了最高潮,西方少数国家几乎占领了整个世界。这几百年的殖民主义扩张史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在大范围改变了世界的语言地图。整个北美洲基本上英语化了,整个中南美洲基本上成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天下,在非洲大陆,英语、法语试图平分秋色,澳洲大陆成为英语的天下,英语覆盖了南亚和东南亚诸多国家,法语在“印度支那”留下了历史遗迹,殖民统治者易主使西班牙语在菲律宾让位于美国英语,等等。甚至中国的香港也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流行起英语。在这几百年的殖民化过程中,人类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人为破坏,“最优秀的土著文化在最劣等的西方文化冲击下陷于消亡”(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的种种悲剧可以说是全球性地发生,其中很多民族语言被消灭或濒临灭亡。

今天,在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网络化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在关注生态恶化、物种消失的严酷现实时也开始关注文化多样性的存亡问题。其中,语言多样性的消亡问题是人们所

关注的热点之一。人类社会从几十万种语言到十几万种语言的过程是以数万年计的,而从十几万到几万的演变则是以数千年计的,从几万种到几千种的变化是以数百年计的。然而,当人们进入 21 世纪之际,语言学家却给人们带来了更加迅速的语言消亡前景:现存的 6000 余种语言可能在 100 年后变成 600 种。姑且不论这些对历史的推测或对未来的预测究竟有多少科学依据,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面临着如同生态环境中的物种消失一样的现实威胁。所以,保护、传承和发展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意识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记录、保护那些濒临消失的文化现象也正在成为人们的行动。生态多样性失衡的后果已经在惩罚人类,文化多样性失衡的后果当然不会惩罚动物。

人类的自然进化并没有终止,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也没有到头,人和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充分的。过去那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进而形成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本身进行种族优劣区分的历史已经结束但余波未消,而今天以文化霸权主义态度来区别人类文化优劣的现实依然存在且浪潮汹涌。人类的自然进化需要各种族、各民族更加广泛地交往(包括通婚)和最终走向融合,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正在解开遗传基因的密码,但是它不可能加速这个过程;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吸收、借鉴人类自身的一切文明成果,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从而实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整合并在更高层次的统一性基础上创造新的多样性,这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现代计算机技术虽然可以创造出虚拟世界,但是它也不可能缩短这个过程。原因很简单,促进或加速这个过程需要人类自身创造的社会环境保障,而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平等。

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发展,前提条件是开放,开放才能交流与合作,开放才能吸收和借鉴。但是,开放的前提是平等,因为平等才能使各个民族自觉地融入开放发展的潮流。在现实世界,国际之间也好、族际之间也罢,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平等理念的实现程度仍然是很有限的。那种将自然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动物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现象并不罕见,那种以“自我中心”标准来判断先进与落后而无视现存文化多样性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成就的现象更为普遍。人们常常为那些辉煌的历史文化遗迹所倾倒和因难以解读而深感遗憾,人们往往对现存的正在消失的所谓“落后文化”无暇顾及甚至心存鄙薄。殊不知,难以解读的历史辉煌正是由于没有得到传承和记录造成的,而我们面对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正在明显消失的现实难道还要为后人留下更多的遗憾吗?进入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保护人类的文明遗存、记录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承人类的文明创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2000 年,在国际上举办了有 50 多个国家参加的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为主题的国际论坛(巴黎),通过了《文化性与文化多样性权利宪章》;在中国召开了数百人参加的“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高级研讨会(昆明),讨论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等文件。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会议,其宗旨是维护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其基础是每一种文化都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这种观念的树立,就是要实现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和”不是以消除异质性为代价的,物种的多样性是保护生态平衡的基础,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保护人类社会和平共处的基础。当然,观念上的平等,需要通过国际社会和平共处的准则和国家内部平等团结的政策来实现。

人类对保护物种多样性的认识远远超过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原因大概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诸多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人与社会的关系则存在“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人类群体形式发展到民族共同体以来,民族关系成为人类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解、规制这种关系的民族政策也应运而生。古往今来,阶级社会的不平等观念放大到民族之间而产生的民族压迫,使民族政策的不平等特征尤为显著。民族征服、驱赶围困、强迫同化的

历史图景比比皆是。甚至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南非还保持着种族隔离政策。当然,“人人生而平等”的追求并非美国独立宣言的首创理念,构建平等的社会是人类由来已久的希望,而“社会主义掌握了这种希望,并对其注入活力”(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并没有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终止,因为苏联及其所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是超越自身发展实际而追求“单一模式”的结果,它只能再次证明人为地消除多样性而盲目地追求一致性必然要付出代价的历史结论。事实上,“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E. 拉兹洛)。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大环境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直在健康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她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保护多样性的政策,而不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去追求消除异质性的统一性。这部著述对中国和有关国家语言政策的“统一性中的多样性与多样性中的统一性”研究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

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交往中最直接的障碍,追求语言同化的强制性政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由此而引发的民族冲突也俯拾皆是。与此同时,在如何承认语言多样性基础上实现国家、民族之间交流的语言共同性,也成为人们的理性思考并开始出现探索一种世界共同语的实践。从圣经所载先知西番亚的预言到 19 世纪柴门霍夫创制世界语,人们对世界共同语的探索孜孜不倦。作为一种理想,这种科学探索是意义重大的。但是,世界共同语的普及需要建立在各个民族语言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不过就世界范围而言,这种充分发展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共性来源于个性中的共同成分,而不是以一种被认为是共性的模式来削足适履地在个性中寻求共性。事实上,每一种语言形成的历史都有其局限性,需要在现实的交流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丰富和发展越充分,各个语言中的共性就越多。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们需要为这些人类文明创造的语言资源建立平等发展的社会政策保证,所以对当今世界各国语言政策的比较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在当今民族大千世界的矛盾冲突中,语言争端是其中的重要动因之一。一些国家对国语地位的追求往往造成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忽视甚至不平等。包括前苏联在盲目判断社会发展进程所导致的简化民族过程中强制推行俄语的政策,其后果不仅在苏联解体中得以显现,而且在解体后的非俄罗斯民族国家中形成了语言政策的民族主义反弹,一些俄罗斯人因为不会讲所在国的国语而沦为二等公民甚至没有选举权。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语言斗争也十分突出。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运动中包含了法语同英语的地位问题,比利时的语言争端由来已久并直接影响到佛拉芒人与瓦隆人如何分享国家权益的国体问题,在国际组织中的法定工作语言使用问题上也争端颇多,而冠之以世界法语国家、西语国家、葡语国家的大会也反映着前殖民地宗主国在全球化时代利用语言纽带谋求对世界市场的控制要求,等等。当然,更为严峻的是世界各国中的少数民族语言问题,这些大都没有文字的语言,由于难以进入教育体系和传媒系统而在现代化发展推动的日益广泛和频繁的国际、族际交往中,不仅面临着发展的困境而且被列为濒危语言的数量不断增多。对这些现象的关注,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共同性号召,成为很多国家对语言政策调整的实践。

当代世界诸语言中,最大的民族语言无疑是汉语,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莫过于英语。所以,有关英语将成为“世界语”的说法十分流行。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现代化的进程必定会带来民族文化的复兴,如新加坡正在着力发展华语,英国的威尔士人为恢复和发展威尔士语舍近求远地送子女去用威尔士语言授课的学校上学,法国人则为保护自身文化的纯洁性

和重振法语的地位而拒绝说英语。当然,也有的语言学家对人类语言的发展趋向另有预测,认为在今后的 500 年中人类语言的数量会增加一倍。“世界社会的巴比伦式的心脏不是在语言统一化的趋势中跳动,而是在各种语言和同一性的错杂交织中跳动。”(乌·贝克·哈贝马斯)其原因之一就是世界上说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增长。一位法国语言学家在接受记者有关法国青少年应该选学哪一种外语为好的采访时,开列出俄语、德语、日语、汉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最后才是英语。他认为“了解语言的多样性比学英语更重要”,而且“英语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缺了它就寸步难行”。面对正在整合的欧洲超国家联盟,他依然认为“欧洲的命运在于语言的多样性”而不是形成统一的欧洲语言(海然热)。无论这些观点如何,强调多样性是一种共识。语言的同一性在民族过程的民族发展阶段只能是通过双语人、多语人来实现。在这方面,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是成绩显著的,这一点在书中已有专门的论述,无需赘言。

今天,作为开放发展的中国来说,在进入新世纪之际有两个重要因素需要引起注意,一是加入 WTO 带来的国际因素,一是西部大开发的国内因素。入世后的中国将更加开放,同时国际化的影响也会日益增强,这不仅是经济竞争的问题,也包括文化竞争的挑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进程中,保护和重建生态环境已经受到高度重视,但是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还认识不够。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要注重这两种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形成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不仅在国内走在了前列,而且也将成为世界上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示范点。但是,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怎么保护、如何传承、怎样发展及其相关政策和法律保障问题都是新的课题。其中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完善和法制化建设也是重要的内容,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意义重大的。所以,我认为《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一书的出版,通过对世界范围语言政策的比较研究为我国的语言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不仅是及时的而且是重要的。

作为题外话,这一研究成果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学科性扩展也是很有意义的。近些年来,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学科分化和研究扩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其中社会语言学即是一个方面。在这方面,梅耶探索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全部关系的努力虽然成绩卓著,但是世事变迁的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却不断增多,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研究需要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去发掘资料,并且顺应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大趋势来发挥语言学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

- [德]J.G.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 祖国》,马胜利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 [美]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 [法]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学科的贡献》,张祖建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 [俄]E. 德雷仁:《世界共通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徐沫译、杭军校,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
- [美]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吴汝康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版。

导 言

本书旨在从国家和民族的视角,研究世界五大洲 22 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全书分五章:第一章,国家利益与国语及官方语言问题;第二章,国家主体民族语言的规划与传播;第三章,国家双语政策;第四章,国家多语政策;第五章,国家“统一多样”的语言政策。

第一章包括 6 篇。1. 苏联篇,描述了近百年来,苏联及独联体诸国语言政策的演变轨迹: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到语言平等政策,从语言融合及双语政策到语言国有化及推广国语政策。2. 美国篇,着重阐述了美国围绕英语的官方化与反官方化而展开的论争,概括了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及保护土著语言的政策。3. 坦桑尼亚篇,分析了该国独立后,成功地选择本土语斯瓦希里语作为国语的原因,以及推广国语所取得的成就。4. 秘鲁篇,回顾了该国从殖民统治到国家独立以来,500 多年间的语言政策的发展,分析了该国独立后,从选择土著语言到改选殖民语言(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原因。5. 哈萨克斯坦篇,叙述了该国在提高国语(哈萨克语)的地位,承认俄语的社会作用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规定和措施,介绍了近年来该国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出现的不同派别及其主要观点。6. 以色列篇,详细阐述了以色列国成立后,成功地将一种古代“死语言”希伯来语,复兴为该国官方语言的原因、过程和措施。

第二章有 5 篇。1. 英国篇,扼要叙述了 600 年来英语的标准化过程,近 300 年来英国传播英语的机构及其成就,以及英国威尔士地区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2. 法国篇,概述了《法语使用法》的内容,官方推广法语的机构以及法语在世界范围的传播。3. 德国篇,追溯了德语统一的历史,描述了德语的法律地位和对外传播德语的政策。4. 日本篇,描述了日语的汉字、假名、罗马字母、敬语和外来语的规范问题,日语的传播及少数民族语言问题。5. 土耳其篇,介绍了土耳其进行语言口语化改革与文字拉丁化改革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第三章有 4 篇。1. 比利时篇,阐述了佛拉芒语(荷兰语)从民间语言发展成为国家两大官方语言之一的过程,分析了影响佛拉芒语地位提升的主要因素,如人口变化、政治制度变化、种族、宗教、经济和国境等等。2. 加拿大篇,叙述了官方双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3. 新西兰篇,追溯了毛利语从一种土著语言发展成为国家两大官方语言之一的过程,同时指出毛利语在推广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4. 墨西哥篇,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理论及双语教育政策,早期奉行的是文化同一理论和过渡性双语教育;20 世纪中期是国民一体化理论和一般双语教育;20 世纪后期为双文化理论和具有保持性特色的双语教育。

第四章有 4 篇。1. 瑞士篇,论述了该国和谐的多语制政策的产生、确立、实施效果及奋斗目标。2. 新加坡篇,概述了国家“一种国语,四种官方语言”的政策,以及以英语为主要教育语言的双语教育政策,分析了语言政策的总目标,即维护和谐的民族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局势,发展高效的经济贸易。3. 南非篇,追溯了国家语言政策的沿革及其引发的主要社会问题,阐述了制定语言政策的依据、语言政策和规划方案及语言机构,分析了影响语言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4. 澳大利亚篇,简要追溯了 200 多年来该国从语言同化向多文化多语言政策演变的轨迹,介绍了近年来国家语言政策的实施情况。

第五章有 3 篇。1. 越南篇，简述了越南语的标准化和规划，以及政府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若干规定。2. 西班牙篇，扼要叙述了西班牙语成为该国通用的官方语言，巴斯克语、加泰罗尼亚语和加利西亚语分别成为地方官方语言的情况。3. 中国篇，提出“统一多样”是中国语言政策的总原则，“统一性”即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多样性”即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既是中国语言政策的特点，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成功经验。

周庆生

目 录

序	许嘉璐(1)
序	郝时远(1)
导言	周庆生(1)
第一章 国家利益与国语及官方语言问题	(1)
第一节 从语言平等、语言融合到推广国语： 苏联解体前后的语言政策	(1)
第二节 官方语言、移民语言与土著语言问题：美国语言政策研究	(22)
第三节 国语的选择与推广：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研究	(40)
第四节 官方语言的选择，从本土语言到殖民语言：秘鲁语言政策研究	(48)
第五节 提高国语地位，尊重双语现实：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研究	(60)
第六节 语言史上的奇迹，从濒危语言到官方语言：以色列语言政策研究	(70)
第二章 国家主体民族语言的规划与传播	(90)
第一节 英语的标准化、传播及威尔士语：英国语言政策研究	(90)
第二节 法语的推广与传播：法国语言政策研究	(101)
第三节 德语的发展与传播：德国语言政策研究	(109)
第四节 日语的规范与传播：日本语言政策研究	(122)
第五节 语言口语化与文字拉丁化的成功改革：土耳其语言政策研究	(132)
第三章 国家双语政策	(141)
第一节 国家的双语化与地区的单语化：比利时语言政策研究	(141)
第二节 官方双语与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语言政策研究	(157)
第三节 一体化中的两种官方语言的关系：新西兰语言政策研究	(165)
第四节 民族文化理论与双语教育：墨西哥语言政策研究	(171)
第四章 国家多语政策	(179)
第一节 和谐的官方多语制：瑞士语言政策研究	(179)
第二节 多语共存：新加坡语言政策研究	(186)
第三节 从官方双语制到官方多语制：南非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196)